

邓小平政治评传

●〔澳〕大卫·古德曼 著

田酉如 李学谦 姜丽蓉 译



邓小平政治评传

〔澳〕大卫·古德曼 著

田酉如 李学谦 姜丽蓉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字:01—95—88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政治评传 = DENG XIAOPING AND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澳) 古德曼
(Goodman, D. S. G.) 著; 田西如等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1995. 11

ISBN 7-5035-1313-6

I. 邓… II. ①古… ②田… III. 邓小平-评传 IV.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816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6000—11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古 德 曼 简 介

大卫·S·G·古德曼教授，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1948年生，曾就读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和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政治与社会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其中有《邓小平传》、《变化中的华南》、《中国静悄悄的革命》、《亚洲的新富人》等，是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和从事研究工作。他是《中国季刊》、《共产主义研究》、《太平洋评论》等刊物的编委。目前正从事抗日战争期间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研究。

中文版前言

在中国出版本人撰写的《邓小平政治评传》既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又是多少有点胆怯的事。这本书一是写给那些母语是英语的读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详细历史还不大了解，再就是写给那些随着传统文化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中国与西方除了其它方面的不同外，在传记的撰写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的读者和诸如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读者比起来，期待的事物是不同的。

我对邓小平的兴趣不是就他个人而言，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产生的。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本书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邓小平的传记，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传记，邓小平的个人习惯、爱好和心理状态——比如，他对足球的爱好、打桥牌和勤奋地工作是广为人知的——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显示了邓对中国改革的某个侧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象邓小平这样重要的

作用。从少年时代起，邓小平就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名早期成员了。邓小平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密切。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这些人中的两位。他们两人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后期开始，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重重困难直到1949年夺得全国最后胜利的许多功绩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如果把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迅速增长也归功于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邓小平。

199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生90周年纪念日，他的女儿邓榕说：不能让这个日子平平常常的过去，因为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对他父亲生日的庆贺，而且也是对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代人的承认。

在1990年，我写了一本短篇的邓小平传记，已经正式出版了。然而，在这本书上市不久，该书的出版商们却由于一些与本书完全无关的原因而陷入了困境，廉价出售存书后，停止了再版。邓小平90岁的生日为我提供了再版扩编和经过认真斟酌的修订版的好机会。中国朋友的鼓励的支持，比四年前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有可能会利用更长的版本对一些史料进行全面的修订，所有这一切都太诱人了。

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邓小平离休以来，在

中国可以得到大量的有关他生活和著作的资料。文献性资料从1989年以来都可以搞到，这一点在这本传记中有所体现。此外，从我上次写的那本邓小平传记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学术界和官员们比以前更愿意接受采访了。在该书的许多地方，他们的谈话已被加注在正文的参考书目中。然而，也有些时候他们提供的是一些笼统而不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仅给人以某种启示，不适于直接引用。我非常感谢那些我曾经访问过并与之谈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但同时声明，他们对该书的出版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这本书是写给母语是英语的西方读者。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英文版正在英国伦敦出版，将在澳大利亚、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发行。本来我可能会改变这本传记的写作方法和某些内容以便使中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我傲慢或者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缺乏了解，我很清楚把这本书展现给中国读者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然而我希望除了中国读者能从该书中了解一些情况外，这本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中国人知道西方学术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总之，中文版的邓小平传还没被重写或者说没有被明显地修正，其目的恰恰是为了勾通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希望中国读者将会欣赏这个观点，原谅我的缺点，

喜欢这个真实的原文。

在该书中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我对邓小平的学术兴趣与对华北地区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太行山区社会变迁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的几年我一直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我最初在中国境外被这个课题吸引时，有关邓小平在太行山区活动的范围和性质大都鲜为人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甚至就是邓小平的孩子们也认为他们自己，用邓榕的话来说，是“太行山的子弟”。然而我被太行山区一方面惊人的贫困和贫瘠的土地与另一方面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高昂的革命激情所形成的显明对比所吸引。当时邓小平不仅在那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充满了显明对比的故事中扮演着重大角色。

一本书的问世离不开众多热心人的帮助，这本书也不例外。在中国有两个人——太原市政府的翟凤伦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西如——在指导我对太行根据史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和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同事和朋友，他们十分慷慨而且又积极主动地向我提出了许多建议，给了鼓励和帮助，为丰富该书的内容和为使该书得以顺利出版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他们是：约翰·克拉克、陈叔平、陈云发、詹姆士·科顿、马克·爱尔兰文、冯崇义、李锐、瑞雪·墨菲、凯·普恩、格里·塞格尔、费雷德·特韦斯、田西如、魏宏运、吴安家和尤

基。特别是陈顺妍一直是我的支持者和鼓舞者。

大卫·S·G·古德曼

悉尼科技大学

目 录

古德曼简介	(1)
中文版前言	(3)
第一章 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1)
中国共产党与夺取政权的道路	(11)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	(18)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政治关系	(27)
争论与人际关系	(32)
第二章 童年时代、青年时代(1904—1937)	(41)
家庭背景与早期生活	(41)
法国生活与中国政治	(46)
从学生到政治工作者	(51)
广西与农民起义	(55)
江西、毛泽东与长征	(59)
第三章 军旅生涯(1937—1952)	(68)
八路军	(69)
太行根据地	(75)

解放战争	(82)
重返大西南	(85)
第四章 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52—1960)	(92)
领导层的冲突	(9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98)
整风运动	(104)
大跃进	(107)
第五章 重建与毛泽东(1960—1966)	(116)
重建	(119)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阶级斗争	(123)
中苏分裂	(128)
文化大革命	(132)
第六章 现代化与斗争(1969—1978)	(141)
江西的岁月	(142)
“四个现代化”	(146)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	(150)
十一届三中全会	(154)
第七章 改革的基础(1979—1984)	(165)
发动改革	(168)
“历史遗留问题”	(174)
政治改革	(177)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81)

第八章 换代交接(1985 及 1985 年之后)	(190)
1985 年的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1)
胡耀邦和赵紫阳	(195)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	(198)
退休与历史	(201)
第九章 对邓小平同志的初步评价	(210)
热爱家庭生活的人	(211)
军事家	(214)
政治家	(218)
改革家	(224)
译后记	(229)

第一章

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

在中国，通常把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认作是改革时代或邓小平的时代。然而，在这段时期，邓小平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担任过书记处的总书记，并两次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职务，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他就不再担任这些职务了。1989年11月，邓小平的退休要求被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批准之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了。人们认为1980年华国锋辞掉共产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就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开始了领导。然而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①

在国内外，邓小平要比那些曾经正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那些人影响要更大。人们几乎都认为整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是中国唯一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齐名。邓小平完全有理

由被认作是中国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位主要人物之一。邓小平取得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对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错误进行的拨乱反正；领导了把中国带入 21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邓小平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形象是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产主义的维新派。这种形象，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之前的那些年中，邓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抛弃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政治枷锁，制定了现代化的蓝图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国急需在国外和对外关系中改变它的形象。邓小平在这种努力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以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日本、西欧和东南亚各国，在休斯敦，邓小平戴着宽边高顶的牛仔帽在电视上露面，使人们觉得他的中国不再具有危险了。邓小平，一个圆脸的矮个子，就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叔一样受到了大家的喜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对苏联的战略中，邓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同盟，美国政府随时可以打中国牌。1979 年邓甚至被提名为美国《时代》杂志本年底的世界风云人物，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首次获得此项殊荣^②。邓的第二个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欢，

就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所留给西方人的复杂印象。

这本传记对邓小平这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两种形象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任何矛盾的表面现象大都超越了其真实性。在西方，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现代化运动一般与民主政治的出现是形影相随的，这种情况可能最终在中国发生，但并不一定说那些在毛后的时代倡导经济现代化的人肯定就是政治上的开明人士，只是这些人更愿搞经济发展而不愿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同样也是他的一种组织活动和他的社会责任。他16岁在法国时与那些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团体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没多久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起，党不仅支配了邓的生活，而且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中国共产党派他去莫斯科，把他培养成为一名政治组织者，然后又返回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1949年取得政权之前，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足迹遍布了全中国。尽管共产党可能在形式上没有决定他应该与谁结婚，但是肯定对他婚姻的选择和离婚有关，在他女儿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邓的所有三次婚姻都是由共产党的同事作媒，就是明显的证

明。^③

在1949年后，邓不仅有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格——特别是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50年代中期担任了党的总书记，而且也有受迫害和诽谤的资格。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邓被撤了职，作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刘少奇之后）受到了严厉批判，在1976年毛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邓又遭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又一次遭到批判并被撤了职务。由于叶剑英和广州军区的暗地保护和支持，邓的这次离职没有遭到太大不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可没有这么幸运。然而，就像在1933年邓受到纪律处分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两次，邓也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尽管这种批评绝对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接受了党的纪律处分，他是以近乎禁欲者的方式接受处分的，等待有机会对他的案子重新申诉。

邓小平也是一位热心的现代化的制定者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决心使中国在上世界上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他对马列主义绝不盲从，显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成功的道路，并不总是在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的著作中。甚至到了90年代，邓始终还是号召中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④但他并不是毛式共产主义政治模式的翻版。邓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

是精神实质和毛所期望的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那些书面上的文字。

在毛逝世后和粉碎“四人帮”之后，准确地讲，如果不是邓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解释，那么毛泽东思想将是邓复职的主要障碍。因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一段时期曾以“两个凡是”为口号发动了一场攻势。这“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在其政治流放中，就强调指出这种论调太僵化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错误的解释。1977年7月，邓复职后不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三中全会上所做的讲话，以他自己的观点阐述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解释。^⑤

事实上，邓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也反复强调具体时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邓有句蜚声中外的比喻：“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尽管这句话直截了当，简明易懂，但是人们对它更深层的含义并不太清楚，某些人还认为这种话是邓的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甚至在中国有人把这句话还作为课题研究。然而当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薄一波问邓对“黄猫黑猫”这个说法现在怎么看？邓回答：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1962年）的情况说的。^⑥

后来一些评论家说邓从来就没有什么原则和政治见解。照此推论，邓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遵章守